



一念离红尘,寂然在空林。本来无内外,分别由此心。老树诗画

## 木心物语

□尹画

先锋书店做过一则活动,由读者票选出十本最喜欢的书,排名第一的是木心的《云雀叫了一整天》。有一则读者评论是这么写的:“从P169-243,都想摘抄下来,秒杀现在任何一个段子手。”

金句纷披。我读木心的书时,也屡屡有此同感。木心的思维极其活泼,字如其人,文字里可以读出他的俏皮、智慧、品位……

昨晚,看了一部关于木心先生的纪录片,名为《木心物语》,再次感受到金句王的魅力。

纪录片分三集:《上海倒影》《纽约散步》《遵彼乌镇》,每集不超过20分钟,短小精致,浓缩了木心先生的一生。

木心出生在桐乡乌镇,少时家境不错,后去上海和杭州学画。读书时代的木心,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勒令退学后,就做起了去巴黎留学的梦。彼时,世界时局不稳,巴黎梦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木心感到平日里什么乐子也没有,除非在街上吃碗馄饨。于是发出如此感慨:“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饨。”

木心的母亲,来上海投奔儿子,和木心居住在一起。母亲总是叫木心早点休息,年轻的木心经常在家约见朋友,怕太晚让母亲知道,于是想出花招,在门铰上涂上点油,这样关门时就不会发生声响。“摸着门铰链涂了点油,夜寂寂,母亲睡在隔壁”,他当时写下这个幽默的俳句。

木心一生中入狱三次。1977年,出狱不久,他拿了自己的50幅转

## 心窗片羽

印小画,偷偷让上海同行观看。大家没发言,因为不知好在哪里。当木心一个人喝酒喝醉了,慨叹“明月清风易共适,高山流水固难求。”

1982年8月,木心前往纽约。初到纽约,人生地不熟,吃尽坎坷。他写了一篇散文《明天不散步了》。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哀愁是什么呢,要是知道哀愁是什么,就不哀愁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定要做的……另有些事做了,没有做好。明天不散步了。”后来,有人问木心:“你是流亡作家吗?”木心斩钉截铁地回答:“No。我是散步,散步散得远了,就到了纽约。”

纽约汇集了一批华人艺术家。应陈丹青提议,木心为他们开设了文学课,讲述“世界文学史”。纪录片里播放了最后一课的片段。木心提到三点:“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79岁那年,木心束装回国,定居在乌镇故居“晚晴小筑”。他的八本著作先后出版。木心很开心,戏说:“我有两个孩子,文学是弟弟,绘画是姐姐。在纽约,姐姐养着弟弟,回到中国,弟弟的风头盖过了姐姐。”

一生颠簸不堪的木心,终于在晚年时光拥有了一个安稳岁月。栖息在故乡小镇的木心,得知政府会给他建造一座美术馆,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笑了。2011年11月21日,木心去世。他最后的手稿是:“功成名就乎,壮志未酬也。”

明天不散步了。然而先生的文字不朽,还在读者心中散步,生生不息。

## 穿衣记续篇

□苏枕书

在京都读书多年,虽经历过若干次入学、毕业典礼,却因不喜欢集体活动,大多没去,更不用说盛装华服合影留念了。最近韩语教室的同窗关心起不久之后的毕业典礼:“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呢?是袴装,还是旗袍,又或者汉服?”我感叹她们已知道汉服,毕竟此前很多讲到中国传统服饰的书籍里,都会说“中国传统服饰之不在”。而如今在京都街头或景点,频繁可见着汉服的青年男女,虽远不及大雪后故宫红墙下的盛况,服饰形制亦不及北京汉服界如今流行的明代衣冠那般整然有序,但毕竟以各种形式对外表明,“旗袍”、各类少数民族服装之外,中国尚有其他类型的“传统服饰”。见我迟疑,她们继续谈到最近日本学校的风气,据说近年小学毕业式也有不少穿袴装的女学生。

袴在古代日本原是宫中贵族女性才会穿着的服装,更多情况下被认为是男性的服装,特别是江户时代武士们有各种类型的袴装,而同时期宫中贵族之外的女性则禁止穿袴。明治维新以后,女子着袴的风习最初从开风气之先的学校里蔓延开来,离乡进入工厂的女性也选择穿袴,因为行动便利,可以迈开大步。这在当时被大加攻击,“我邦妇女昂然着袴,毫无羞耻之意,甚哉奇异之风体,实可谓辱国”云云。因而在明治十六年(1883),文部省曾一度禁止女学生着袴。这一年,也是鹿鸣馆建成的年份,是日本欧化主义的全盛期。1885年,萨摩藩士出身的森有礼就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展开了各种教育改革,提倡“良妻贤母教育”,强调为了国家的未来,有必要加强对孕育未来国民的母亲们的教育。这位有过留英经验的森有礼醉心欧化,认为英语应该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并要求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等女校学生穿洋装。但承担着“良妻贤母”职能的女性的服装,并没有像被视为近代化国民的男性的服装那般干脆、顺利地西化,女子穿袴装尚且被认为是辱国行为,穿西式蓬蓬裙更难被社会普遍接受。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典礼之日,在欧化道路上过分激进的森有礼被同样激进的国粹主义者西野文太郎暗杀,他的女学生洋服推广计划也就此告终——只有男性才有资格追求身体与服装近代化,作为未来良妻贤母之储备的女学生,还是穿保守的传统服饰为妥。

到19世纪末期,日本的女校已基本确定以袴装作为校服。束起前部长发、余发披肩、袴装的打扮,是明治中后期以来女学生的标准装束。正如夏目漱石小说《我是猫》里写过的这段:“突然有个奇怪的来客。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一双歪跟的皮鞋,

## 他胆子小

□文彦

“我先生对自己的病不知情,也麻烦你们不要告诉他,他胆子小,要知道了,可能马上就崩溃。”她说。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子,眉宇间萦绕着淡淡愁云。我们表示理解,她退出去,轻轻合上门。

半小时后她先生坐在我面前,身材魁梧,眉目俊朗。男人四十正是意气风发时节,小巧的妻子站在他身旁,把高头马大的男人搂在怀里,“不要看,没事,不疼

紫色袴装擦过地面,头发如算盘珠子一般鼓起来,招呼也不打,便从便门走上来。这是主人的侄女。”当时的女学生还喜欢穿袴装骑自行车,这样的形象也成为版画的新题材。从存世旧照片来看,清末赴日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亦多着袴装。这在当时是一种入乡随俗的新鲜尝试,但民国之后,随着衫裙、旗袍等逐渐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加上民族主义、反日情绪的高涨,留学日本的女性也很少在公开场合穿着日本传统服饰,这当然与其时日本女性服饰的西洋化也有关系。到中日战争时期,许多中国留学生都离开了日本,仍有少数人勉强在异国继续学业。有关当时东京中国女性留学生的着装,有这样一段记述:“至于穿的问题,她们在家时常穿本国的旗袍,外出时总是更换了西装,否则会引起一般日本人的少见多怪。因为旗袍在日本,尚不多见,尤其是那些日本女子,对中国女学生的旗袍,常会发生异样的感觉,在街上,她们常常竟会停下步来对你当作模特儿似的鉴赏着,这对被鉴赏者,实在是最难受的事情。为了节省金钱起见,她们在课余之暇,也入洋裁学校,从事自己制作西装,既省钱,又省布。”(骏霓《中国女留学生在东京》,《侨声》第3卷第10期,1941年)穿和服难以与自己的民族情感相符;穿旗袍固然好,但走在战时敌国街头,作为女性,有难以预料的风险(被围观尚属小事);唯有西装最安全,因为这是“近代”“先进”“文明”的象征,乍一看难分国界,只知是受了教育的、不可轻慢的现代女性。这也是为什么1920年代以后,许多出入都市、受过教育的朝鲜女性也选择洋服,而不愿穿传统赤古里的缘由。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1920年代中期),水手服式的制服逐渐成为各类学校的通用女学生制服,其主要目的在于提倡节俭、方便运动。除了战时物资统制令时期的所谓国民服之外,水手服式的女学生制服一直通行至今(当然有不少变化)。而昔日女学生的代名词——袴装,逐渐成为大学毕业之际的特定装束。每至三月下旬,各处大学纷纷举行毕业典礼,街中可以频频见到着袴装、手执花束或毕业证书的女生。她们的袴装大多是租借,价格不能说十分便宜,因此更显出纪念的意义。

但这种风气影响到小学生的毕业典礼,自然会引起“奢侈”的批判,因而有不少小学明令禁止。有家长抗议,认为自己有打扮女儿的权利,女儿也有着装的自由。也有家长表示,自己家境普通,并无余钱为女儿租借袴装,但若其他学生都穿,要是不给女儿租,又很对不起女儿,也担心女儿遭遇别人的冷眼。“校服才是最平等的服装。”

在留学以前,也曾憧憬过袴装,想效仿清末留学的女生,穿袴装行走在街头,只差一把佩刀。有意思的是

是,昔日被认为只有男性才可穿着、女性穿着便败坏风气、涉嫌辱国的袴装,今日早已成为“凛然端庄”的女性传统服装。那时处于对日本文化的恋爱期,对诸事都有一层朦胧的温情与善意。但在此地生活日久,益发觉出日本社会对着装的苛刻,其中又以对女性装束行止的要求格外繁杂。职场要求穿正装、化妆自不必说,甚至有些工作不允许女性戴眼镜,因为“显得冷漠”“不符合卫生要求”(后者显然牵强)。在任何正常国家,这都是匪夷所思的角度。也许眼镜意味着读书多,不够“良妻贤母”、不够“可爱”——如今简直对“可爱”一词到了反感的地步。既然对日本的服饰文化不太认同,当然也没有必要特地穿袴装。

至于汉服,曾也很感兴趣,但眼看其与民族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非早期最被诟病的所谓皇汉派),便也敬而远之。再比如十多年前很喜欢的一部文辞典雅的小说,近来影视化,服饰、陈设无不精美考究,却因其在宣传时总提些“君臣父子、家国天下”“衣冠故国”,顿觉索然无味。无论哪国的传统文化,看来都容易成为点缀这类口号的装饰,虽然“与现代结合”也是常见的模式,但若这“现代”也开始追慕往昔呢?服饰是生活,是文化,也是身份认同、国族认同、价值认同,特别是女性的服饰,往往成为关注或攻击的焦点。念及此处,便不能不重新整理自己对于穿衣的看法,对传统服饰的态度也更谨慎。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毕业式我大约还是选择穿现代服装。

最后想分享一段有关传统服饰的体验。去年岁末在釜山旅行,不少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主妇在釜山以缝制韩服补贴家用,遂形成韩服一条街。我起意寻访一番,还动了购一套的心思。寒风萧瑟的街头,避开许多配色,裁剪不合我意的“改良韩服”,终于找到一家看起来十分传统的店铺,店内婆媳二人席地对坐,正做针线。听说我要买韩服,店主模样的阿姨很讶异,问我是不是朝鲜族,答曰不是。问是不是嫁给了韩国人或韩裔,仍答不是。这才问我想要什么配色,脑海中浮现出红蓝、绿蓝等端庄雅静的好颜色。店主自有立场,认为我宜穿鹅黄赤古里与翠绿裙,穿上后确如少女般,依稀记得《阳光先生》里高小姐也有这样的一身配色,新鲜得令我不好意思。一旁从周幽幽道:“可是有什么场合能穿呢?”的确,作为嫁给中国汉族人的中国汉族女性,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必要和理由穿韩服,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的行为(若是欧美人,或许还可作为某种东方趣味)。尽管很觉抱歉,我还是及时停止了自己的探索,只当是无知外国游客的冒失举动,小心告退。我行为当中微妙的尴尬、冲撞、失礼及越界,恰也说明传统服饰所包蕴的民族特征及性别意涵。

## 医院物语

的。”男人的头埋在她胸前,仿佛是雏鸟躲在母亲怀抱。“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人了,还怕打针。”她笑着数落。

男人跟着我们进到检查室,她在身后。“不用的,他一个人就行,里面有放射线。”我说。

“没事,他胆小,我陪陪他。”她毫不犹豫地。

“就是一点小息肉,非得让我手术,这个那个的。”男人检查完埋怨着。

“放在里面你放心呐,万一恶变

了咋办?还是要听医生的。”她推着他出门。

没多久她又来了,“我先生的检查怎么样?医生说可能转移了。”

我们看着她,不情愿地点点头。泪水瞬间蓄满她的眼。“怎么会这样?一直身体好好的。”

没有人能回答她,大家只是默默看着。

“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她擦了擦眼,嘴角勾出一个笑弧,退出去,轻轻带上门。